

首都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后的东地中海世界

姓名：代成兵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世界史

指导教师：夏继果

20080516

摘要

十字军东征是中世纪欧洲发生的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它高举着宗教的“圣战”旗帜，由西方走向东方去恢复“圣地”，驱逐异教徒，来扩大基督教世界和其影响。而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在所有的十字军东征过程中则具有明显的自身特征，它发生了“转向”，攻陷了同宗的拜占庭帝国，使拜占庭帝国陷入分裂与衰落，这一结果还使东地中海地区的主要国际力量发生了变化，同时，东征还客观上促进了东地中海地区的交流与互动，对于整个东地中海地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全文共分三章：

第一章论述了经过第四次十字军的劫掠，原来貌似强大和统一的拜占庭帝国瞬间土崩瓦解，拜占庭帝国的历史从此改变，国家陷入分裂，拉丁人开始在此建立起统治——即拉丁帝国的建立，拉丁帝国的出现是东征各方“分赃”的结果，由于缺乏坚固的统治基础和国力的贫弱，拉丁帝国的存在时间非常短暂。1261年，君士坦丁堡的收复并没有使拜占庭重新走上国家富强之路，拜占庭反而更加积贫积弱，第四次十字军所带来的后果可谓严重的。

第二章分析了拜占庭帝国的沦陷给东地中海的国际格局带来了巨大变化。意大利航海共和国开始主宰东地中海的命运，威尼斯在半个多世纪里垄断了此地区的贸易，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后来热那亚觊觎威尼斯的海上利益，为此和威尼斯展开争夺，并由此引发了两国在东地中海地区的长期争霸战争；拜占庭帝国的分裂和衰落也给塞尔柱突厥人兴起以可乘之机，塞尔柱突厥人逐渐插手拜占庭帝国的内部事务，给拜占庭的灭亡带来了隐患，塞尔柱突厥人的扩张，给亚欧政治格局带来了重大影响。

第三章介绍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虽然给拜占庭带来了灾难，但它在客观上也带来了一些积极的因素。东西方的地理障碍被暂时打破，东西方的交流和融合出现了新的现象和特征。意大利商人利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胜利成果，建立起连接东地中海的顺畅的商业网络，把东地中海地区纳入了意大利人的商业版图，中世纪地中海贸易圈出现雏形；天主教进入到东正教的传统教区，同宗宗教的冲突与相容也是这一时期的一个特征；西欧封建制的植入，必然会给东方社会带来冲击，但这也是一个适应和融合的过程，东西方贵族统治阶层的融合与同化也是这一时期的一个特色。

关键词：第四次十字军 拜占庭 威尼斯 冲突与融合

Abstract

The crusades were far-reaching events in Europe medieval history. The crusaders held “holy war” banner to restore the “sacred place” from the West to the East, and expelled the infidels. They wanted to expand the Christian world and its impact. The Fourth Crusade in all of the crusades had the obvious features of their own, and it happened “diversion” to capture the Constantinople, which was the capital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So the Byzantine Empire became split and decline. The results also brought many changes of major international powers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reg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crusades campaign objectively promoted exchanges and interactions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region and brought far-reaching impacts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st Mediterranean region.

The full text is divided into three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discusses after the looting of the Fourth Crusade, the Byzantine Empire collapsed instantly, which was originally looked strong and unified. The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had changed, and the country became splitting. The Latins established their rules in this region, that was, the Latin Empire. Because of lack of solid foundations and the weak of the national power, the existence of Latin empire was very short. In the year 1261, the recover of Constantinople did not bring the prosperity to the country, but even poorer and weaker,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Fourth Crusade were serious.

The second chapter analyses the fall of Byzantine Empire brought the tremendous changes to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Maritime Republic of Italy began to dominate the destiny of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Venice monopolized trades in this area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and it founded a huge colonial empire; Genoa coveted maritime interests of Venice, so Genoa and Venice started to fight for the trade interests in this area, which triggered a long-term hegemony war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region. The split and the decline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also gave an opportunity to the Sejuks to rise. The Sejuks gradually intervened internal affairs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which laid a great hidden danger to the Byzantine Empire, The expansion of the Sejuks brought about a significant impact to the Asia-Europe political situation.

The third chapter discusses although the Fourth Crusade brought the disasters to the Byzantine, it also brought a lot of positive factors objectively. East-West geographical barriers were temporarily broken, the East-West exchanges and integrations appeared new phenomena and

features. Italian businessmen took advantage of the fruits of the victory of the Fourth Crusade, and established an unhindered commercial network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region became the domain of Italian business, and the rudiment of trade circle had appeared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when the Catholic Church entered into the Orthodox Church, religious conflict and integration was also a feature of this period; the Western European feudal system transplantation, was bound to impact on the Byzantine society, but it was also a process of adaptation and integration, and the integration and assimilation of East and West aristocrats was also a feature of this period.

Key words: The Fourth Crusade; Byzantine; Venice; Conflict and Integration

首都师范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提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代成兵

日期： 2008年5月16日

首都师范大学学位论文授权使用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首都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学校有权保留学位论文并向国家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交论文的电子版和纸质版。有权将学位论文用于非赢利目的的少量复制并允许论文进入学校图书馆被查阅。有权将学位论文的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有权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规定。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代成兵

日期： 2008年5月16日

绪论

十字军东征是中世纪欧洲发生的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它由天主教会发起，以驱逐塞尔柱突厥人、收复圣地为目标，以解放巴勒斯坦基督教圣地(耶路撒冷)为口号，而进行的东扩运动。而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在所有的十字军东征过程中则具有明显的自身特征，它发生了“转向”，攻陷了同属于基督教的拜占庭帝国，东征的目的在这次事件中失去了它原来的含义，这次事件对地中海地区尤其是东地中海地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所研究的十字军运动是指传统意义上的 1096-1291 年的历史，即由乌尔班二世所号召的第一批十字军东征到十字军在中东的最后一个堡垒阿克城被攻陷的历史，而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则是指 1202 年在教皇英诺森三世号召下十字军东征开始，到 1204 年君士坦丁堡陷落这段历史，第四次十字军后的历史时段本文界定在从 1204 年开始到 13 世纪末或 14 世纪初期这一“中时段”的历史时期^①。

东地中海地区在中世纪是一个非常重要和活跃的地区，这一地区的贸易和文化交流比较频繁，关注此地区的跨地区和跨文化交流及其相互影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把东地中海纳入一个具体的时间框架内进行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楚的看出此地区在一个时期内的发展变化，对于我们还原历史、认清史实，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目前关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研究中，主要的关注点落在它的“转向”上。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唐纳德·奎勒和托马斯·马登在两人合著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拜占庭的征服》^②一书中，详细的记述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整个过程，着重强调了 1021 年十字军和威尼斯签订的运兵协议是导致整个运动转向的最重要因素，认为这是“威尼斯为十字军所准备好的陷阱”，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唐纳德·尼科尔在其《拜占庭与威尼斯——外交和文化关系研究》^③和汤普逊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④，以上观点可称之为“威尼斯阴谋论”；W. B. 巴特莱特在《非神圣的战争——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和君士坦丁堡的陷落》^⑤一书中，认为欧洲东西方的文化冲突是导致这次事件的根本原因，长期以来，东西方的互相猜忌和不信任，以致西方甚至认为拜占庭篡改了基督教的根本教义，“已经成为了上帝的敌人”，迈克尔·安古尔德在其《拜占庭帝国政治史 1025-1204》^⑥也持此种观点，

^① 关于“中时段”的理论，本文主要采用的年鉴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所给出的历史时段理论。中时段以节奏缓慢、周期变化为特征，以表示某些社会历史现象的趋势或周期，它不是几年、一年、几个月或几天，而是 10 年、25 年或 50 年乃至 100 年的较长的历史时期。（张广智：《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06 页。）

^② Donald E. Queller and Thomas F. Madden, *The Fourth Crusade: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with an essay on primary sources by Alfred J. Andre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7.

^③ Donald M. Nicol, *Byzantium and Venice: A Study in Diplomatic and Culture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④ [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⑤ W. B. Bartlett, *An Ungodly War: The Sack of Constantinople & The Fourth Crusade*, Sutton Publishing, 2000.

^⑥ Micheal Angold, *The Byzantine Empire, 1025—1204: A political history*, Longman, 1997.

即“文化冲突论”；乔纳森·哈里斯在其《拜占庭和十字军》^①一书中就认为，此次东征是教皇英诺森三世处心积虑吞并东方教会的阴谋，整个十字军的行动都是其一手的导演，即“教皇阴谋说”；前苏联学者扎波罗夫在其《十字军东征》^②中则对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持“多种政治因素论”，教皇的权力欲、封建主的土地欲、威尼斯的贸易利益欲、德皇士瓦本的腓力和孟菲拉侯爵对于东方领土的觊觎，以及拜占庭皇子阿莱克修斯四世的丰厚许诺，这一切的结合，就构成了东征的动力。

目前对于第四次十字军后的东地中海世界的研究也有了一些成果，但是关注度还是不够，尚缺乏系统性、深入性的研究。

对于第四次十字军对于拜占廷的影响，也有学者对此做了关注，例如大卫·阿布拉非亚在其主编的《新编剑桥中世纪史》（卷四）^③中，就论述了第四次十字军对于拜占廷所造成的分裂局面，认为第四次十字军使拜占廷帝国彻底碎片化了，另外他还分析了拉丁帝国的生存状态。另外大卫·雅可比在其《十字军国家与威尼斯扩张研究》^④中，也对拜占廷国家的分裂做出了很多的分析，并且对于西方人在拜占廷境内所建立的封地封国进行了具体的探讨。另外，汤普逊在其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⑤也简单的记述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对拜占庭所造成的后果和影响。

另外，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给中世纪东地中海国际格局造成的影响的关注上，主要有多纳德·尼科尔的《拜占廷与威尼斯：外交和文化关系研究》^⑥他指出，灭亡拜占廷是威尼斯的主要目的，也是威尼斯建立海上商业帝国的一个步骤，同时威尼斯的行动还遭到其它意大利海上国家的抵制和对抗，同时，大卫·阿布拉非亚在其《地中海的碰撞：经济、宗教、政治，1100-1550年》^⑦中，也分析了威尼斯对于东地中海地区商业贸易的垄断，以及意大利商业在东地中海的活跃。

在东地中海地区东西欧交流方面，对此进行研究的有大卫·雅可比的论文《两种社会的相遇：第四次十字军之后的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西方征服者和拜占庭》^⑧，详细的论述了第四次十字军之后的希腊地区的变化，探讨了西欧封建制度在拜占廷帝国的移植，以及西欧骑士贵族与原拜占廷贵族之间的融合情况；大卫·阿布拉非亚在其主编的《新编剑桥中

^① Jonathan Harris, *Byzantium and the Crusades*, Hambledon and London, 2003.

^② [苏]扎波罗夫：《十字军东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9 年版。

^③ David Abulafia, eds.,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ume V c.1198—13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④ David Jacoby, *Studies on the Crusader States and on Venetian Expansion*, Variorum Reprints, 1989.

^⑤ [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⑥ Donald M. Nicol, *Byzantium and Venice: A Study in Diplomatic and Culture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⑦ David Abulafia, *Mediterranean Encounters, Economic, Religious, Political, 1100-1550*, Variorum Reprints, 2000.

^⑧ David Jacoby, *The Encounter of Two Societies Western Conquerors and Byzantines in the Peloponnesus after the Fourth Crusad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78, No. 4.(Oct.,1973),pp.873-906.

世纪史》(卷四)^①也对东征后东地中海的商业贸易进行了研究,在地中海东西部经济交流、黑海贸易的开展等方面进行了具体论述,同时,M. M.波斯坦在其主编的《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二卷)^②中,也对此时的地中海贸易进行了详细的探讨,认为此时的贸易已经形成了一股潮流。

而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在尚有欠缺,现在只有陈志强在其《拜占庭帝国史》^③和《拜占庭学研究》^④中,对于与拜占廷涉及各方面进行过论述,主要集中在拜占廷的政治史和少量的经济史。因为是专著,作者没有对东地中海的地区的变化做出探讨。

综上,国内外的学者虽然对东地中海做了很多具体的研究,而往往是关注于其中一个地区,没有把东地中海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过,对于整个地区的互动与交流关注不够。

本文拟从全球史和整体史的角度来重新阐释这段历史,以布罗代尔的“中时段”理论线索为指导来观察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对东地中海地区所造成的后果和影响,并且探究当时东地中海地区的交流与互动。

^① David Abulafia, eds.,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ume V c.1198—13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② M. M.波斯坦等主编,钟和等译:《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二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③ 陈志强:《拜占庭帝国史》,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④ 陈志强:《拜占庭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第一章 拜占廷的分裂与衰落

十字军的东征给拜占廷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尤其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直接给拜占廷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和国家的衰落与分裂。第四次十字军的劫掠，使原来貌似强大和统一的拜占廷帝国瞬间土崩瓦解，拜占廷的历史走上了另一条道路，拉丁人开始在此建立起短暂的统治，东西方的碰撞，给东地中海地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节 拉丁帝国的建立和拜占廷帝国的分裂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西方人的国家——拉丁帝国的建立，拉丁帝国在东方存在了 57 年（1204-1261 年），它的建立和存在当时的环境下有着其独特的含义。同时，因为它是一个妥协的产物，一旦利益分属清楚，它就失去了它作为妥协的作用，就会失去各方的关注，也注定了它的存在时间的短暂。透视一下拉丁帝国在东方的存在过程，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楚的看出第四次十字军对东方造成的影响。

在攻占君士坦丁堡之前，威尼斯总督丹多罗就与法兰克十字军首领达成了瓜分拜占廷的协议，主要有以下几点：占领君士坦丁堡后，十字军将在城市建立拉丁人的政府；十字军各方将按照协议瓜分君士坦丁堡的战利品；组成威尼斯和法兰克人各占 6 名的委员会，负责选出治理新国家的皇帝；皇帝将占有被征服首都的 1/4，包括两个皇宫，其它 3/4 将由威尼斯和十字军对半分；圣索菲亚教堂和大教长职位将属于威尼斯；所有十字军战士都将获得或大或小的封地，并按西欧的方式向皇帝效忠；只有威尼斯总督丹多罗可以免除效忠仪式^①。拉丁帝国就是这次“分赃会议”的产物。“西方人或拉丁人于 1294 年 4 月 13 日攻陷了君士坦丁堡，在拜占廷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即通常所认为的拉丁帝国时代，这个事件不仅沉重打击了拜占廷的军事力量、政治组织和国际声望，更加深和加速了自 25 年前肇始的帝国的分裂，并最终使其走向瓦解”。^②

事实上，十字军对被占领后的领土的瓜分基本上是按照 1204 年 3 月“分赃会议”确立的原则进行的。攻陷君士坦丁堡后，首都君士坦丁堡由拉丁皇帝鲍德温和威尼斯总督丹多罗占有，前者分得城区的 5/8，后者得到城区的 3/8。鲍德温^③作为拉丁帝国的皇帝还得

^① Donald E. Queller and Thomas F. Madden, *The Fourth Crusade: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with an essay on primary sources by Alfred J. Andre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7, p.163.

^② David Abulafia, eds.,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ume V c.1198-13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525.

^③ 鲍德温，拉丁帝国第一任皇帝，原是法兰西的一个贵族，他的上任是十字军首领卜尼法斯侯爵和其他十字军头领以及威尼斯妥协的产物。

到了色雷斯南部地区，连接波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小亚细亚西北部地区，另外，爱琴海上的一些大岛，如利斯布利斯岛、萨莫斯岛和休斯岛等，也归鲍德温所有，皇帝的实际控制区域基本上是占领土地的 1/4，在剩下的拜占廷其余 3/4 领土的分割中，威尼斯获得剩下的部分的一半，其余的领土将按照西欧模式，用封地的方式来分配给东征的十字军骑士们^①。

原东征十字军首领孟菲拉侯爵卜尼法斯分得了小亚细亚部分地区，塞萨利地区和马其顿地区，他名义上是拉丁帝国皇帝鲍德温的一个封臣，但实际上他与 1204 年在中希腊从色雷斯到科林斯的广大地区建立了自己的独立王国，即萨洛尼卡王国（Kingdom of Thessalonika），法兰德斯的亨利成了阿德拉克兴的领主，勒尼尔·得·特列茨成为菲利波波利的公爵；圣波尔的休格成了迪狄摩太春的领主。小块封地，按照每个指挥官的等级和随员人数，分成 100 个，60 个，50 个，40 个骑士封地等直到 10 个骑士封地来分配^②。

新建立的拉丁帝国在拜占廷帝国的废墟上按照西欧分封制改造社会结构，这是继十字军瓜分拜占廷遗产后对拜占廷社会更严重的瓦解。拉丁帝国领域内所有的国土理论上都属于中央帝国，各个小国内的封建领主又结成以土地分封为基础、以封建等级义务为纽带的领主附庸之间的主从关系。君主和各级封建主将土地分封给自己的下属，并对附庸的土地财产和人身安全提供保障，同时，附庸要向领主宣誓效忠，承担军事、司法和其它若干义务，例如萨洛尼卡王国的卜尼法斯国王分封威廉为阿塞亚侯国侯爵，后者又将侯国分封给 12 个贵族，而各个贵族再分封给骑士^③。“被拉丁人占领的广阔领土变成了一个拼凑起来的政治实体，许多占领地非常狭小，它们的统治者相互联结在一种复杂和变动的封建分封关系的网络之中”。^④正是这种分封，使拜占廷的社会分裂进一步加剧。

攻陷拜占廷后，十字军首领孟斐拉侯爵卜尼法斯以为建立自己东方帝国的时机到了，就迫不及待的想给自己加冕，然而，他的这种想法在威尼斯和其他十字军头领那里都碰了壁，“他们不想在东方又出现一个强有力的主人统治着自己，而减少自己所分享的东征成果”。^⑤于是，威尼斯和其他十字军首领推出了弱小的、容易控制的法兰西贵族鲍德温，卜尼法斯侯爵鉴于各方的掣肘，加上他在封地方面得到了实际的利益，也就没有坚持，于是，拉丁帝国诞生了。在各种势力争夺和妥协下产生的拉丁帝国，注定了其生存能力的孱弱。首先，它缺乏稳固的统治基础，拉丁帝国对于被征服的拜占廷人心存疑忌，主要依靠西方

^① Donald E. Queller and Thomas F. Madden, *The Fourth Crusade: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with an essay on primary sources by Alfred J. Andre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7, p.165.

^② David Jacoby, *Studies on the Crusader States and on Venetian Expansion*, Variorum Reprints, 1989, p.117.

^③ David Jacoby, *Studies on the Crusader States and on Venetian Expansion*, Variorum Reprints, 1989, p.118.

^④ David Abulafia, eds.,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ume V c.1198—13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525.

^⑤ Terry Jones and Alan Ereira, *Crusades, Facts On File*, 1995, p.127.

人的统治，大大小小的西欧骑士成了帝国统治的基础，而这些骑士全由西方各国的封建主组成，他们所关注的只是自己的封地，缺乏对于帝国的效忠心和凝聚力，一旦帝国有事，他们就不会倾其全力来保卫拉丁帝国；其次，“拉丁帝国的生存能力被长期短缺的财政和军事资源严重削弱了，这种削弱也在于其缺乏坚固的、长期的由西方援助的协议”，^①拉丁帝国统治区域的狭小决定了其兵源和财税的短缺，帝国的重要港口基本上都掌握在威尼斯人手中，他们或免于关税或征收很低的关税，“1210年，威尼斯商人马博罗出口到君士坦丁堡的丝织品全部免于关税，马博罗用赚取的利润装载了三条船返回威尼斯，而以前仅装满两艘船”，^②在农业不景气的情况下，帝国的关税收入并没有给其自身带来多大的收益，战争结束初年，其它的税收的征收也并不顺利，帝国的国库经常入不敷出。这种情形严重影响了拉丁帝国，在面临外敌入侵时不堪一击，在拉丁帝国建立的中后期，在流亡的拜占廷皇室所建立的尼西亚拜占廷的重压之下，拉丁帝国皇帝鲍德温二世于1237-1239年和1244-1248年两次赴西欧进行广泛求助。在他第一次出访西欧时，拉丁帝国的贵族们向威尼斯放债人抵押了帝国的王冠来作为13134个金币（hyperpers）的偿还担保。1248年鲍德温二世欠了威尼斯商人2400个金币，后来，为了偿还另一笔贷款，他把他唯一的儿子菲利普作为人质抵押，使他的儿子在威尼斯的放债人看管下度过了很多年。1260年，鲍德温二世为了筹集帝国防御的费用，被迫把君士坦丁堡宫殿屋顶上的铅剥落下来筹钱。这时的拉丁帝国已经失去了当时作为东征各方相互妥协的筹码的作用，西方各方都只顾自己的利益，甚至威尼斯，尽管它在艰难挣扎的帝国中有自己的经济利益，但它只是偶尔的提供海军援助^③。勉力挣扎的拉丁帝国走到了它生命的尽头。

在原来拜占廷帝国境内，除了拉丁占领区内建立的拉丁帝国和其它封地外，还存在着三个拜占廷流亡政权：尼西亚帝国（Empire of Nicaea）、伊庇鲁斯王国（Despot of Epirus）和特拉比仲德帝国（Empire of Trebizond），这三个国家都是反对拉丁帝国统治的坚定力量。其中存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是尼西亚帝国。尼西亚帝国是由阿莱克修斯三世的女婿、拉斯卡里斯家族的塞奥多利（Theodore Laskaris）在君士坦丁堡城破之际被创立的，逃出后得到突厥苏丹的支持在尼西亚定居下来。在多次击败拉丁帝国的进攻之后，尼西亚帝国的势力不断发展，并公开宣布继承拜占廷帝国的政治正统。从此，这里成为流亡的拜占廷文臣武将的聚集地，也成为拜占廷继续反抗拉丁统治的中心。1261年，也正是尼西亚拜占廷

^① David Abulafia, eds.,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ume V c.1198—13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530.

^② Donald M. Nicol, *Byzantium and Venice: A Study in Diplomatic and Culture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225.

^③ David Abulafia, eds.,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ume V c.1198—13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530.

灭亡了拉丁帝国，恢复了拜占廷对帝国的统治。

灭亡拉丁帝国后建立的帕列奥列格王朝，是拜占廷帝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王朝，但也是最衰弱的王朝，它控制下的领土仅包括君士坦丁堡及其郊区、萨洛尼卡、摩里亚、塞萨利和靠近色雷斯海岸的利姆诺斯岛。^①远在黑海南岸的特拉比仲尼名义上是拜占廷帝国的领土，但实际上独立于中央政府。巴尔干半岛西部的伊庇鲁斯地区一直与中央政府对抗，直到被新兴的塞尔维亚人征服也没有承认帕列奥列格王朝的宗主地位。在这些零散的领土之间，散布着保加利亚、突厥等外族敌对势力。帕列奥列格王朝没有能力收复其它的拜占廷领土，且其收复的拜占廷君士坦丁堡地区也处在其它势力的虎视眈眈之中，迫使其重防御而不敢于开疆扩土，间接的把拜占廷的分裂状态给稳固了下来。

第四次十字军东侵彻底摧毁了拜占廷统一帝国的基础，一方面，它把统一的帝国撕成大小不等的碎片，在原拜占廷帝国版图内存在着各自独立的帝国、王国、公国、专制君主国、骑士领地和自由城市共和国，它们相互攻伐，矛盾错综复杂，很难重新统一起来；另一方面，西方封建制度引入拜占廷，瓦解了社会统一的基本结构，使晚期拜占廷长期陷入类似西欧中世纪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再也没有能力依靠自身的凝聚力重新发展为强国。

第二节 拜占廷的衰落加剧

拜占廷的衰落是一个延续的历史过程，十字军的攻占只不过是直接加速了这一过程。拜占廷的衰落自 11 世纪就显露端倪了。12 世纪时，拜占廷帝国社会矛盾不断发展，诸如大地产的兴起，小农经济的瓦解，大贵族势力加大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军区制的衰落等等，诸多问题开始显露。这些问题不断发展，成为无法克服的社会痼疾，使拜占廷帝国的社会内部经历了由盛到衰的深刻转变。

帝国军事化社会结构的瓦解使 11 世纪以后拜占廷发生的最深刻的变化，军区制的衰落和大贵族势力的迅速兴起，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即是明显的标志。拜占廷的经济基础是以军区制下的小农经济为根本的。军区制^②是按照军区、军分区、师、团等军队划分原有的行政区，军区内各级官兵均按照其服役的级别和军种接受土地，并将经营土地的收入作为军饷和军需物资的来源。这种军政合一、农兵合一的管理制度既是拜占廷帝国军事行政改革的成果，也是其经济制度改革的结果。对拜占廷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军区制下，农民军事化、土地兵役化，农兵平时以生产为主，战时以打仗为主，戍边屯垦，生

^① Timothy E. Gregory, *A History of Byzantium*,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p.225.

^② Micheal Angold, *The Byzantine Empire, 1025—1204: a political history*, Longman, 1997, p.65.

产自助，这就将生产和战争、农业和军事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保证了国家的军队人力资源和军需的经济来源，解决了军队人力和财力不足的紧迫问题。可以说，军区制下小农经济兴起奠定了10、11世纪拜占廷帝国“黄金时代”的物质基础^①。但是随着军区制的发展，以农兵为主体的小农阶层兴起的同时，以大地产制为核心的军事贵族也悄然崛起。

军区制下的小农经济十分脆弱，经受不起自然灾害和战争的打击。随着占有大地产的军事贵族的迅速兴起，小农经济瓦解的过程大大加速。大贵族往往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限制辖区内小农的发展，进而侵害小农的利益来扩张经济实力，从而导致小农破产。大地产主利用小农破产之际，以提供庇护为代价将小农土地吞并，并对小农的人身自由权利实行控制，使小农日益丧失独立性，迅速沦为大地主的农奴。虽然拜占廷政府采取多种方式限制大地产制的扩张，但由于缺乏执行力度，效果并不明显。小农的地位得不到切实的保障。到“12世纪，拜占廷的国有小农几乎完全消失”。^②9世纪以后，大地产军事贵族悄然兴起，至10世纪，其势力已经坐大，对拜占廷帝国中央集权构成直接威胁。10世纪前期，拜占廷皇帝们颁布的法令使其成为中央政府限制地方军事权贵斗争的开端，“这一斗争成为10世纪拜占廷帝国全部内政演化的核心，……不仅决定了农业状况嗣后的变化，而且也决定了拜占廷帝国的命运”。^③这场斗争以军事贵族的胜利为结束，小农经济也逐渐走向衰落，拜占廷国家经济基础也因此瓦解，演变为大地产经济占主导地位，其政治上反映便是大地产军事贵族的代表阿莱克休斯一世（Alexios Komnenos，1081-1118在位）登上皇位。而拜占廷帝国衰落的直接表现便是其小亚细亚、南意大利和巴尔干地区统治的瓦解，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攻克君士坦丁堡和拉丁帝国在拜占廷的短暂统治只是加速了拜占廷帝国衰亡的过程^④。

以大地产为后盾的贵族成为拜占廷帝国前后期国家政治分裂的主要因素。他们不仅凭借其经济实力与中央政府抗衡，而且直接参与皇族内讧，有的甚至爬上皇帝宝座。公元11世纪期间，军事贵族的叛乱愈演愈烈，他们不仅兵临首都城下，而且推翻当朝皇帝，自立为帝。在此期间，至少有5位皇帝，即塞奥多拉（Theodora，1042-1056）、伊萨克一世（Isaac Komnenos，1057-1059）、米哈伊尔七世（Michael Doukas，1071-1078）、尼基弗鲁斯三世（Nikephoros Botaneiates，1078-1081）和阿莱克修斯一世（Alexios Komnenos，1081-1118）都是以军队哗变的方式爬上皇帝宝座的^⑤。11世纪后半期建立的科穆宁王朝（Komnenian

^① Micheal Angold, *The Byzantine Empire, 1025—1204: a political history*, Longman, 1997, p.67.

^② Timothy E. Gregory, *A History of Byzantium*,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p.217.

^③ 奥斯特罗戈尔斯基：《中世纪拜占廷帝国的农业状况》，转引陈志强：《拜占庭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2页。

^④ Jonathan Harris, *Byzantium and the Crusades*, Hambledon and London, 2003, p.239.

^⑤ Micheal Angold, *The Byzantine Empire, 1025—1204: A political history*, Longman, 1997, pp.221-223.

Dynasty, 1081-1185) 就是几家大军事贵族, 如杜卡、帕列奥列格、康多斯代法尼等家族的联合政权。这些大贵族通过联姻等方式勾结起来, 控制帝国政治。在拜占廷帝国末代王朝统治的时期, 皇亲国戚大贵族各霸一方, 分别在伊庇鲁斯、特拉比仲德和巴尔干南部拥兵自重, 不承认君士坦丁堡皇帝的最高宗主权。直到 15 世纪初, 拜占廷帝国灭亡前夕, 各地大贵族仍然各自为政, 对危在旦夕的首都坐视不救, 甚至那些被围困在君士坦丁堡城内的教俗贵族宁肯让金钱烂在地下, 也不肯借给皇帝用于战争。君士坦丁堡失陷后, 大贵族仍然置灭族灭国之灾于不顾, 在摩里亚和特拉比仲德等地激烈争斗、相互厮杀, 直至全部沦为突厥人的奴隶^①。

军区制的衰败对拜占廷军队建设也产生了不利影响, 以本国兵源为主体的农兵日益减少, 代之而起的是罗斯人和诺曼人雇佣兵。晚期拜占廷国家的财政收入大多成为这些雇佣兵的军饷。而且, 雇佣兵作战的目的与本国农兵不同, 极易发生哗变, 肆虐于拜占廷腹地。12 世纪诺曼人雇佣兵的反叛就给拜占廷中心地区的巴尔干半岛造成持续数十年的兵祸^②。至 13 世纪初, 拜占廷几乎到了兵不能战或无兵可用的地步, 只能依靠外国雇佣兵。这样一来, 拜占廷国家出现了大批突厥人、诺曼人、斯拉夫人、瓦拉几亚人雇佣兵, 由此造成了拜占廷兵匪横行的局面。拜占廷军队实力急剧下降的直接后果是: 13 世纪初拜占廷人在数千十字军骑士的攻击下, 竟使城防坚固的君士坦丁堡轻易落入敌手。从此, 拜占廷帝国就沦为东地中海的一个小国, 失去了昔日的雄风, 只能在强国之间周旋, 苟延残喘^③。

随着军区制的发展和军事贵族的兴起, 小农的土地必然遭到吞并, 小农经济也会趋于衰败, 从而瓦解了军区制存在的经济基础, 进而促进了拜占廷的衰亡。

1261 年, 尼西亚皇帝重新统一了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 形成了复兴的拜占廷帝国。但是拜占廷并没有从第四次十字军打击下恢复元气。以帕列奥列格王朝诸皇帝为代表的帝国“复兴”是不完全的。帝国并没有恢复它先前的领土统一, 也未曾恢复失去的权利。直到 1453 年灭亡时, 它一直是一个残缺不全的国家。尼西亚拜占廷皇帝米哈伊尔八世仅仅把古代科穆宁帝国的一部分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色雷斯被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占领着; 亚德里亚海岸形成的伊庇鲁斯君主国, 处于威尼斯和西西里王国的夹击之中, 处境比较危险; 撒帖利是一个独立王国。伯罗奔尼撒半岛是雅典和阿黑亚公爵领地, 处于法兰西王朝统治之下。艾维亚岛被伦巴底血统的王公统治着。爱琴海诸岛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了独立的纳克索斯公爵领地。因此, 新的拜占廷帝国仅包括巴尔干半岛的中部和东部以及小亚

^① Timothy E. Gregory, *A History of Byzantium*,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p.325.

^② Micheal Angold, *The Byzantine Empire, 1025—1204: A political history*, Longman, 1997, p.267.

^③ Timothy E. Gregory, *A History of Byzantium*,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p.260.

细亚西部。另外，热那亚人取代了威尼斯在东方的地位，他们在东方建立殖民地，并且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卡拉特特区^①。

经济上，尤其是商业上的变化，更能够说明拜占廷帝国前后期的巨大变化。帝国前期经济繁荣，蒸蒸日上，呈现出一派帝国盛世景象，而到了尼西亚拜占廷收复君士坦丁堡以后，商业贸易则一落千丈，经济呈现一片混乱和衰退。

拜占廷地跨亚欧两大洲，而君士坦丁堡连接黑海和地中海，联结亚洲大陆和欧洲大陆，更是沟通与西方的金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迅速发展成为欧洲和地中海世界最大的商业贸易中心，城区内巨大的商业区成为当时最大的各国商品集散地，而“黄金角湾”则是各国商船最集中的水域。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欧洲和地中海国际商业网的形成是公元7世纪以后该地区经济格局中出现的明显变化之一。后来，随着阿拉伯人和拜占廷人的贸易恢复正常，大宗商业贸易的直接进行，使得拜占廷商业经济在9、10世纪时发展到最高峰。据12世纪犹太旅行者图德拉的本杰明在1166年或1167年对君士坦丁堡商业活动的繁荣以及各族商人的众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自己的商店里看到了“来自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梅蒂亚、波斯、埃及、巴基斯坦、俄罗斯、匈牙利、帕特辛那西亚和保加利亚、意大利北部的伦巴底和西班牙”的商人。他认为只有巴格达可与这里媲美。他补充说，皇帝曼努埃尔仅从君士坦丁堡就可以得到20000磅黄金的税收，可以肯定的是，大部分税收来源于外国居民和商人^②。

然而，自11世纪以后，拜占廷工商业开始衰落。由于塞尔柱人征服了小亚细亚，夺取了君士坦丁堡谷物的主要供应地和拜占廷实力基础的大量农业人口，从而改变了整个拜占廷经济。与小亚细亚无休止的战争干扰了它的陆路甚至沿海贸易。以此同时，诺曼人对南意大利的征服导致海盗入侵繁荣的希腊半岛，这严重威胁到帝国在欧洲的所有行省。同时，意大利临海城市增加了其商业舰队并一步步地侵占东部市场。1082年，面对突厥人的步步进逼，科穆宁王朝皇帝阿莱克西斯一世向威尼斯寻求海上和财政援助。1092年，皇帝颁布《黄金诏书》(Golden Bull)，给予威尼斯人贸易特权：在帝国重要的港口城市，除克里特和塞浦路斯及黑海沿岸少数港口外，威尼斯可以免关税自由贸易，并允许其在君士坦丁堡建立商业区。后来，意大利城市比萨和热那亚也获得了类似特权^③。这些特权对拜占廷国际贸易产生了极为严重的消极影响。而第四次十字军对君士坦丁堡的洗劫彻底摧毁了以该城为中心的与地中海的商业贸易结构，意大利城市国家取代了拜占廷人的商业垄断地位。

^① David Abulafia, *Mediterranean Encounters, Economic, Religious, Political, 1100-1550*, Variorum Reprints, 2000, p.271.

^② Krijnie Ciggaar, *Western Travellers to Constantinople: the West and Byzantium, 962-1204: cultural and political relations*, Brill, 1996, p.185.

^③ Donald M. Nicol, *Byzantium and Venice: A Study in Diplomatic and Culture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173.

第四次十字军之后，拜占庭帝国商业贸易一蹶不振，再也未能恢复。1204—1261年威尼斯在君士坦丁堡建立起商业垄断地位。1261年，热那亚帮助拜占廷皇帝重新夺回君士坦丁堡，于是继威尼斯人之后成为帝国的特权剥削者。一个拜占廷历史学家悲哀地写道，“拉丁人不停地增加他们的赢利和海上权利，然而希腊人却越来越衰弱”。^①这个重建的帝国几乎没有什么国际贸易。14世纪早期，在热那亚的贸易据点佩拉完成的贸易量大约超过拜占廷首都15倍。至14世纪中期，拜占廷关税的81%被热那亚人所掌控，他们设在君士坦丁堡的海关年收入为20万依波里拉金币，而同期拜占廷帝国海关收入仅相当这一个数字的15%。^②

货币的贬值也是拜占廷帝国衰亡的主要原因，帝国金本位的崩溃，更加深了帝国的经济危机，帝国经济陷入一片混乱，帝国进一步走向衰亡的深渊。商人科斯马斯·印戴奥蒂科普勒厄斯特斯（Cosmas Indiocopleustes）在6世纪写道，（拜占廷）帝国的繁荣有两个原因：基督教和铸币。^③君士坦丁一世曾规定把一磅黄金作为货币制度的基础。诺米斯玛也就是金币，起初称为苏勒德斯（Solidus），13世纪之后又称为海披伦（Hyperpyron），与1磅黄金的兑换率固定在1/72。诺米斯玛包含一定数量的金价值约为15法郎，理论上其纯度为24克拉。

在君士坦丁九世（1042-1055年）统治时期，由于挥霍浪费，货币贬值开始了。他发行了5种类型的诺米斯玛及两种类型的特塔特伦（Tetareron）——即成分不足的诺米斯玛，每种货币的真正价值都在逐年降低，米哈伊尔七世（1071-1078年）时，贬值加速了，到尼基弗鲁斯三世（1078-1081年）时，诺米斯玛降到了8克拉的低水平，而这时特塔特伦已经消失了。诺米斯玛，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海披伦，一开始就有轻微的贬值。第一次十字军战争时，它可兑换15个法兰克人的银苏（Sous），1156年热那亚将其价值定在10银苏，即大约14.60金法郎（Francs）。1250年尼西亚拜占廷将其海披伦定为16克拉，1261年为15克拉，1282年为14克拉，到1310年为12克拉和12克合金，这种贬值在继续^④。14世纪中期以后，拜占廷金币原有的国际货币地位被威尼斯和热那亚所取代，工商业破坏使拜占廷帝国丧失了任何经济自立的能力和复原的最后希望，这种可悲的境地清楚地反映在当时作家的记载中，他们预感到：“现在这座都城的末日已经来临，此时，我们已经看到我们民族的死光”。^⑤

^① Benjamin Z. Kedar, ed., *East-West Trade in the Medieval Mediterranean*, Variorum Reprints, 1986, p.207.

^② G. Ostrogorsky,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p.527.

^③ M. M.波斯坦等主编，钟和等译：《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二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7页。

^④ G. Ostrogorsky,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pp.571-572.

^⑤ 米哈伊尔·杜卡：《拜占庭史》（Michaelis Ducae, *Historia Byzantina*，波恩1834年版，第238页），转移自陈志强：《拜占庭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114页。

帕列奥列格王朝（Dynasty of Palaiologos, 1259-1453 年）的近 200 年的统治期间，作为拜占廷帝国政治中心的君士坦丁堡已经完全破败，国库空虚，皇帝只能靠变卖皇家财产、土地或者借款度日。拜占廷皇帝约翰五世（1341—1391 年在位）因急需金钱而将达达尼尔海峡入口处的泰多斯岛以 3.5 万杜卡特卖给威尼斯人，他还将镇国之宝的皇冠抵押给威尼斯人，换来 2.5 万杜卡特和几条战船。安娜皇后甚至下令将宫中仅存的金银器皿融化铸造货币，应付财政危机^①。拜占廷帝国已名不副实，国家政治混乱，经济衰退，社会动荡，军队瓦解，列强任意欺侮，外敌肆意蹂躏，它只能在周围强国之间苟延残喘。

^① Timothy E. Gregory, *A History of Byzantium*,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p.227.

第二章 东地中海地区主要力量的变化

拜占廷帝国的沦陷，给东地中海的国际格局带来了巨大变化，意大利航海共和国开始主宰东地中海的命运，威尼斯在半个多世纪里垄断了此地区的贸易，建立起一个殖民帝国；后来热那亚觊觎威尼斯的海上利益，为此和威尼斯展开争夺，并由此引发了两国在东地中海地区的争霸战争；拜占廷帝国的灭亡也给塞尔柱突厥人兴起以可乘之机，给亚欧格局带来了重大影响。

第一节 威尼斯海上帝国的建立

威尼斯海上帝国的建立，与拜占廷的关系是分不开的。威尼斯位于意大利北部，原是亚德里亚海中的几个礁湖岛，始建于 421 年，6 世纪时伦巴德人入侵意大利时，威尼斯成为难民的避难地。当时威尼斯属于拜占廷帝国在意大利的拉文那总督管理，751 年，拉文那失陷后，威尼斯由君士坦丁堡直接管辖。810 年，法兰克军队进犯威尼斯遭到失败，两国君主订立亚森条约，确定威尼斯为拜占廷帝国领地。此后，威尼斯由地方贵族统治，承认拜占廷皇帝的宗主权，并由拜占廷政府派员监督。9 世纪，威尼斯总督彼得·特里布诺（Doge Peter Tribuno）依靠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逐渐摆脱了拜占廷帝国的控制^①。独立后，威尼斯航海业迅速发展，首先取得了亚德里亚海的制海权，垄断了海上贸易，并在反对阿拉伯人的海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期间，威尼斯向拜占廷帝国进行经济扩张，通过海上运输逐渐控制了拜占廷帝国的谷物市场，并进行了奴隶贸易。992 年，拜占廷帝国正与保加利亚进行战争，急需从海上牵制保加利亚人，为了得到威尼斯的海上支援，拜占廷皇帝瓦西里二世给予威尼斯商人以贸易特权，对于威尼斯在帝国范围内的贸易活动予以免税，给威尼斯商人提供政府保护，并严禁帝国官员对威尼斯商人敲诈勒索；同时，作为交换，威尼斯在帝国需要的时候提供舰队援助^②，1001 年威尼斯参与拜占廷帝国对达尔马提亚地区的战争；1004 年，威尼斯人再次根据协议派遣舰队帮助拜占廷军队渡海，支援在巴里的驻军抵抗阿拉伯人的入侵。威尼斯获得的拜占廷帝国的贸易特权有助于其海上势力的发展，其几乎完全垄断了从君士坦丁堡与小亚细亚向西方运输的贸易。

在 11 世纪，诺曼诗人亚浦利亚的威廉曾以雄壮的声调歌颂“威尼斯的商业洪流已这样壮阔”。^③当时，热那亚和比萨在拜占廷帝国内，没有获得什么立足点。威尼斯的贸易特

^① Donald M. Nicol, *Byzantium and Venice: A Study in Diplomatic and Culture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43-45.

^② Donald M. Nicol, *Byzantium and Venice: A Study in Diplomatic and Culture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135.

^③ David Jacoby, *Studies on the Crusader States and on Venetian Expansion*, Variorum Reprints, 1989, p.173.

权对拜占廷商业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破坏了传统的拜占廷国际贸易体系，瓦解了拜占廷重要的经济基础，也开启了西欧商业势力瓜分拜占廷帝国商业权益的先例。此后，热那亚等其他意大利共和国也获得了和威尼斯同等的商业特权。

1082年，拜占廷皇帝阿莱克西斯一世授予威尼斯人更多的商业特权，使他们从此获得了在君士坦丁堡建立威尼斯商业区，征收部分关税以及在科林斯等拜占廷帝国重要海港自由进出的权利，这些特权对拜占廷和拜占廷国际贸易产生了极为严重的消极影响。据统计，在十二世纪，君士坦丁堡的商业数量比原来数量跌落了1/3到1/2。^①威尼斯在东地中海的兴起引发了其与拜占廷帝国的冲突。1171年，拜占廷皇帝曼努埃尔一世将威尼斯人驱逐出君士坦丁堡，没收了他们的财产，限制威尼斯人的特权，缩小其在拜占廷帝国内的经济影响，从而使两国关系陷入紧张状态。1171年3月曼努埃尔借口威尼斯商人违法，采取突然行动，大批逮捕威尼斯商人，查抄其店铺，没收其财产。威尼斯人则立即派遣舰队进攻拜占廷帝国。1175年，双方重新订立商约，拜占廷帝国重新给予威尼斯人各项贸易特权^②。同时，拜占廷帝国也向热那亚和比萨等其他意大利航海共和国提供同样的商业特权，防止一方独大，以实现力量平衡。这种平衡战术激怒了威尼斯，而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给了威尼斯以复仇的机会。

于是，第四次十字军在威尼斯的导演下攻克了君士坦丁堡，偌大的帝国瞬间四分五裂。威尼斯从这次行动中获得了巨大的权益，使它迅速成为一个拾得巨大金蛋的暴发户。在战后权力分配上，威尼斯取得了一半还多的权力：选举新的皇帝选举团12人中，威尼斯占6人，除拉丁皇帝拥有的帝国1/4领土外，其余3/4领土威尼斯获得了一半；在君士坦丁堡的划分上，皇帝拥有5/8的面积，威尼斯拥有3/8并且加上圣索菲亚大教堂，并且威尼斯的总督免于向皇帝行效忠礼，俨然是另一派君主模样。

威尼斯占有的拜占廷帝国的领土中，都是一些关键性的岛屿和港口，以使威尼斯能更好地保证其海上优势。它占有了摩里亚半岛上的摩敦和科隆港（以胭脂红出名）、阿卡内尼亚、爱奥尼群岛、伯罗奔尼撒、爱琴海中的岛屿、科孚、色雷斯的优卑亚。另外，根据1204年8月和孟菲拉侯爵卜尼法斯所签订的秘密条约，威尼斯还获得了克里特岛^③。“威尼斯人由于他们商业上的狡猾成性和由于他们较多熟悉地方情形，在瓜分条约里，曾获得所有黎凡特的最优良港口、岛屿和市场。几乎没有一只战舰，没有一只商船，在驶入‘多海岛’（即爱琴海）、黑海或亚速夫海时，不被科隆和摩敦港口上的威尼斯守兵所看到的；这

^① Robert S. Lopez and Irving W. Raymond, *Medieval Trade i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llustrative Documents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p.247.

^② Donald M. Nicol, *Byzantium and Venice: A Study in Diplomatic and Culture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170.

^③ Ellen E. Kittell and Thomas F. Madden, ed.,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Venic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9, p.215.

两港很合适地被称为‘共和国的眼睛’。^①

就这样，威尼斯在半个多世纪里在东地中海的统治地位确立了，它从“禁海”里逐出每个商业竞争者，尤其是热那亚，汤普逊曾在其著作《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评论说：“从罗马衰亡到 1498 年到印度去的航路发现之时期，第四次十字军对黎凡特贸易史上进行了最重要的革命。因为它使威尼斯成为近代第一个殖民帝国。”^②

威尼斯所获得的新领土，对于城市共和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和有诱惑力的，以至于元老院竟要总督迁都到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向一切非热那亚的欧洲人开放。比萨和阿玛尔菲仍可以拥有拜占廷皇帝统治时期所赐予的权力，伦巴底人、丹麦人、普罗旺斯人、西班牙人和安科尼坦人也来到君士坦丁堡，所有这些都依靠威尼斯的庇护才能留下，它的一句话等于皇帝的一道诏令。威尼斯是城内的支配权力，它享有绝对的贸易自由，并收取从这些商业区所得的 3/8 进款^③。

由于第四次十字军的胜利，威尼斯占据了坚固设防的加利波利，占有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和君士坦丁堡 3/8 的面积，获得了黑海航行的垄断地位。到 1223 年时，他们在克里米亚半岛上已建立起若干“商站”。威尼斯的商船穿梭在多瑙河、顿河和法息斯河各河口上。威尼斯人曾在顿河口建立一块叫塔那（即亚速夫）的殖民地。这块殖民地成为亚洲商业的一个主要商埠。从印度来的货物跨越广袤的大陆，到达阿姆河，然后把货物转运到黑海，在阿斯特拉罕卸下，再用骆驼把货物转运到塔那。从塔那再把货物分散到黑海各港口去。威尼斯和亚洲内地的蒙古王公所签订的条约使威尼斯人与这些游牧民族能够进行更有利的交易^④。由于在黑海北岸的特拉比仲德和小亚细亚的尼西亚的两个拜占廷残余势力的存在，妨碍了威尼斯与叙利亚及亚科辛海上的贸易。在小亚细亚，虽然在 1215 年第四次拉特兰宗教会议上重申，基督教徒禁止与穆斯林通商，但威尼斯不顾禁令与爱科尼安苏丹签订了同盟条约来反对尼西亚拜占廷的塞奥多利及其以后的拉斯克里斯一世。1219 年威尼斯又同爱科尼安苏丹阿拉丁签订了另一项条约，根据条约，威尼斯商人在苏丹境内获得人身安全的保证，并且对货物征收的关税也做出明确的规定^⑤。

在与拜占廷进行贸易的同时，威尼斯不顾教皇关于禁止与穆斯林贸易的法令，继续与法蒂玛王朝的埃及进行半公开的贸易，并且垄断了埃及的国际贸易。882 年在亚历山大港已有威尼斯的商船，从那里运回了圣马可的遗骨。和埃及进行的主要是奴隶和武器贸易。

^① Donald M. Nicol, *Byzantium and Venice: A Study in Diplomatic and Culture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221.

^② [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518 页。

^③ David Jacoby, *Trade, Commodities and Shipping in the Mediterranean*, Variorum Reprints, 1997, p.125.

^④ David Abulafia,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editerranean, 1100-1500*, Variorum Reprints, 1993, p.253.

^⑤ MRS. Oliphant, *The Markers of Venice: Doges, Conquerors, Painters and Men of Letters*,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05, p.221.

与埃及贸易的利润大得惊人，“据估计，一只商船往返一次，有时可获得多至 1200% 的利润”。^①除此之外，威尼斯商人还经营别的东西：他们把达尔马提亚和亚德里亚海的铁以及木材出口到缺乏此两种商品的埃及，并把那里的丝绸、香料及其他奢侈品运回。这样，威尼斯商人就成了连接中世纪最富饶的两个首都的信使。^②

在黑海北岸，威尼斯虽然不能占领特拉比仲德，但它成功地垄断了亚美尼亚的商业。1201 年、1245 年，威尼斯和亚美尼亚国王签订了两次通商条约。1229 年，威尼斯还同阿勒波苏丹签订了条约，条约赋予了威尼斯人在阿勒波建立一个商站、教堂和领事裁判权的权利。^③

整个 13 世纪上半叶，威尼斯垄断了东地中海地区的贸易，并且建立广泛的殖民地和商业特区，它的船只在东地中海和黑海各处游弋和贸易，在拜占廷拉丁占领区，威尼斯也拥有着独特的政治地位，超然事外而又左右政局，始终能够使威尼斯的获取的利益最大化。在十三世纪，教廷正在极盛时代；当它对半个欧洲政治命运挥舞微风凛凛的大棒时，威尼斯却控制着大部分意大利和黎凡特的商业命运。^④

至此，威尼斯在 13 世纪开始登上东地中海权力顶峰，一个商业殖民帝国建立起来了。

第二节 威尼斯与热那亚在东地中海地区的争霸战争

威尼斯在获得君士坦丁堡和垄断爱琴海和黑海贸易的辉煌功绩，使热那亚的仇恨达到疯狂地步。这两个国家为争夺黎凡特的贸易控制权而起的冲突，是十三世纪地中海世界的突出商业事件，几乎所有大海沿岸国家，都被卷入漩涡。^⑤

威尼斯和热那亚的仇恨非一日之功，主要是双方的商业利益的冲突的结果。1177 年，热那亚在威尼斯居于垄断地位的埃及单独同苏丹谈判，并且获得在埃及的商业权利和特权。威尼斯人在埃及的贸易垄断地位被打破，一个贸易劲敌陡然出现在其面前，这一年，也是热那亚和威尼斯长期冲突的开始。同时，早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时期（1147-1149 年），热那亚就已经在君士坦丁堡获得了立足点，并在 1154 年扩大了其特权。热那亚的这种扩张，对威尼斯来说是一种冒犯，双方的矛盾和战争不可避免。同时 1155 年，拜占廷皇帝曼努埃尔一世为防威尼斯势力过大，而授予热那亚同样的特权，并且依赖和信任热那亚人，

^① [美]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403 页。

^② [美]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403 页。

^③ Johann P. Arnason and Björn Wittrock, ed., *Eurasian Transformations, Tenth to Thirteenth Centuries: Crystallizations, Divergences, Renaissances*, Brill, 2004, p.264.

^④ David Abulafia, *Mediterranean Encounters, Economic, Religious, Political, 1100-1550*, Variorum Reprints, 2000, p.225.

^⑤ J. K. Fotheringham, *Genoa and the Fourth Crusade,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25, No. 97. (Jan., 1910), p.35.

使热那亚人在竞争中优势明显，这更使威尼斯怒火中烧。而在第四次十字军时期，威尼斯对热那亚在东地中海的驱赶，则使这种矛盾激化了。^①“教皇的野心、路易五世的十字军、安茹·理查的成功或阿拉冈诸王的成功，都是依靠并集中在这两个航海国家身上：因为他们，也只有因为他们，是地中海的主人翁。在威尼斯和热那亚作战的时候，要进行十字军的出征，是不可能的。因而教皇费了无穷的时间，加以耐心劝解和恫吓以求和平的实现。路易不能从亚格—摩特开船，除非获得这个或那个竞争者的帮助，阿拉冈国王的登陆以及同理查的冲突都是依靠热那亚帮助的。可是，对于这些事情，热那亚和威尼斯都毫不介意。它们各专心致志于遏制对方，如果可能，还要粉碎对方。什么能够使它们真正感到感兴趣的是：它们的海军司令，像它们所曾做过的那样，将携回亚克的热那亚塔上的石头到威尼斯来，携回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宫殿上的石头到热那亚来。达达尼尔海峡口，对它们来说，比“” 圣塔” 还要宝贵得不知多少倍。”^②

热那亚痛恨威尼斯，因为它被挤出黑海之外。威尼斯也极其担心其垄断地位的丧失，所以尽力维持它。控制巨大的东方贸易曾是威尼斯在 1204 年征服拜占廷帝国的决定性动机，也是热那亚于 1261 年推翻威尼斯在黄金角统治权的目的。

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巨大的商业竞争的目的，都是想获得黑海和爱琴海的贸易控制权，双方围绕着拜占廷地区的商业贸易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早在拉丁帝国统治时期，热那亚就与尼西亚拜占廷流亡政府关系密切。1261 年，两国签订了反威尼斯的南菲宏条约：规定两国结成长期盟友，并允诺绝不单独与威尼斯媾和；热那亚人提供由 50 艘战舰听从拜占廷皇帝的指挥，舰队的费用则由拜占廷人支付；热那亚享有过去拥有的所有商业特权，并增加在以弗所、斯米尔纳和阿特拉米森等城市的热那亚商业区；热那亚人的财产将受到拜占廷政府的保护，包括在拜占廷水域失事船只的财产赔偿；如果双方发生争执，热那亚政府将参与裁决。^③该协议目标直接对准威尼斯，支持热那亚在东地中海发展商业势力并参与对威尼斯的贸易竞争，使热那亚在半个世纪迅速成为东方贸易的强国，其商业势力范围远及黑海沿岸，进而引起东地中海商业格局的变动。同年，拜占廷人收复君士坦丁堡后，热那亚遂取代了威尼斯在东地中海的地位。不久之后，热那亚舰队击溃比萨海军，使热那亚成为东地中海东方贸易中最强大的势力。“热那亚人把黎凡特贸易的垄断权从威尼斯转移到他们自己手中。被授予在整个希腊帝国……自由经商的特权。热那亚人被批准在阿那卡、赖斯波斯和盛产乳香的开俄斯岛建立殖民地……他

^① Charles M. Brand, *Byzantium Confronts the West, 1180-1204*, Gregg Revivals, 1992, pp.127-129.

^② [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520-521 页。

^③ Marcia Merryman Means and Neil Sohlager, eds., *The Crusades: Primary Sources*, Thomson Gale, 2005, p.213.

们获得了士麦那城，并获准在光复君士坦丁堡后，以其郊区卡拉特作为热那亚特区，最后，对他们的敌人封闭黑海。自 1261 年南菲宏条约签订之日起，热那亚就作为黎凡特势力开始发展。”^①

君士坦丁堡的光复使威尼斯处于防御地位，他们被迫从君士坦丁堡赶出来，并被热那亚取而代之。^②威尼斯仅仅保留了它先前领土中的克里特岛以及伯罗奔尼撒半岛海岸的科隆和摩敦。两大岛屿盛产小麦、油、酒、蜂、蜂蜜、生丝和熟丝。威尼斯在东地中海权力的丧失使其极为不甘，时时想恢复它在东地中海的商业霸权地位，为此和热那亚开始了漫长的争霸战争。

1284-1381 年间威尼斯与热那亚为争夺东地中海的霸权进行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战争。1284 年热那亚与威尼斯在梅洛里亚发生小规模冲突，热那亚获胜，战争遂起。1294 年，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酝酿已久的大规模战争爆发了。热那亚舰队袭击了克里特岛上的坎迪亚，并摧毁了摩敦港内一支威尼斯商船。威尼斯则攻击君士坦丁堡的热那亚卡拉特商业特区，并摧毁了弗西亚岛热那亚人的明矾作坊。随后，拜占廷皇帝没收在帝国境内发现的威尼斯商人的货物，热那亚人也与当地人一起对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商人进行大屠杀。最后，威尼斯和热那亚于 1299 年媾和。直到 14 世纪，双方的战争时起时伏，频繁发生。1325 年威尼斯联合对热那亚不满的拜占廷皇帝约翰六世以及传统盟友比萨发动了一场针对热那亚的战争，结果在佩拉港大败。然而，第二年却在撒丁附近大胜热那亚人。1379 年热那亚人在波拉不远的地方击败了威尼斯舰队，并且占领了威尼斯共和国的一个主要岛屿——基奥贾岛。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的最后一战发生在 1381 年，当时热那亚竭尽全力猛攻威尼斯在忒涅多斯岛的堡垒，但在基奥贾附近的海战失利。那一年都灵媾和结束了热那亚与威尼斯之间的商业竞争。热那亚被耗费巨资的战争和内讪弄的筋疲力尽，1396 年，法国人占领了热那亚。

战争基本上也是实力的比拼，相对于热那亚，威尼斯无论从经济实力还是从外交策略上都比热那亚略胜一筹，它与同样是海洋国家的比萨结盟，共同对付热那亚，在必经的东地中海商路上，热那亚的船只经常遭到劫掠和攻击，使其贸易和供给线处处受阻，而威尼斯在竭力保持东地中海原有的贸易路线的同时，还积极参与欧洲大陆的贸易，香槟集市上处处可见威尼斯商人的身影。威尼斯此时还与刚兴起的国家法兰西结盟，使热那亚内外受困，最终失败。战争结束后，一位威尼斯议员这样评论说“对热那亚的战争，在长期消耗交战双方的资源方面，是可怕的，但结局如何，一向在意料之中的（指威尼斯能最终取

^① Timothy E. Gregory, *A History of Byzantium*,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p.246.

^② David Abulafia, eds.,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ume V c.1198—13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525.

胜)。”^①

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商业竞争是 14 世纪黎凡特历史的关键。双方在黑海地区、巴尔干半岛、爱琴海诸岛和摩里亚、叙利亚和圣地、埃及五个地区展开竞争。争霸的结果是热那亚最终战败，威尼斯笑到了最后。漫长的争霸过程，使参战各国都深深感到疲惫。同时，双方的争霸还把地中海地区各国都牵扯进来，双方既有战争，也有对话，促进了东地中海地区的互动与交流。

第三节 塞尔柱突厥人的崛起

拜占廷的衰落在东地中海地区尤其是小亚细亚地区造成了暂时的权力真空，其与塞尔柱突厥人的相互制衡的状态被打破，正好给了塞尔柱突厥人崛起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塞尔柱突厥人抓住拜占廷衰落的时机，大力扩张，最终登上了东地中海的国际政治舞台，给东地中海地区乃至整个西欧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塞尔柱突厥人(The Sejuks)原是活动在咸海附近地区的游牧民族。11 世纪前期，他们向亚洲西部迁移，在小亚细亚东部地区与拜占廷军队发生接触。当时，拜占廷在这里的军区边防部队已经被君士坦丁九世(Constantine Monomachos, 1042-1055 年在位)撤销，所以对塞尔柱突厥人的入侵未能采取任何有效抵抗措施。11 世纪中期，塞尔柱突厥人就征服了阿拉伯人，逐步控制了过去属于阿拉伯的领土，并在拜占廷东部边境地区形成对帝国的巨大威胁。1071 年夏季，塞尔柱突厥军队在亚美尼亚东部幼发拉底河畔重镇曼兹克特(Mantzikert)大败拜占廷皇帝罗曼努斯四世(Romanos Diogenes, 1068-1071 年在位)亲自统率的军队，俘获皇帝本人，使拜占廷元气大伤。^②后来塞尔柱突厥人还占领了拜占廷帝国在小亚细亚的大部分领土，并于 1081 年在距离君士坦丁堡附近的尼西亚城建立都城，此后，在塞尔柱苏丹苏里曼(Suleyman Ibn Kutulmus)和梅利克沙(Malikshah)统治期间，塞尔柱突厥人准备进攻君士坦丁堡，并夺取叙利亚首府安条克城，并由此引发了拜占廷皇帝向西欧求救而出现的十字军东征浪潮。12 世纪塞尔柱突厥人国家发生内战，西亚地区形成许多小国，其中比较强大的丹尼斯曼迪德斯王朝(The Danismendis, 1085-1178 年)于 1176 年击败拜占廷军队，迫使皇帝曼努埃尔一世承认其占领领土的合法性，丹尼斯曼迪德斯王朝此时已经控制了小亚细亚帕多西亚地区，其势力鼎盛时期范围扩大到整个艾利河流域。13 世纪以后，在这片被成为“罗姆(即被征服的罗马人的土地)”土地上形成了强大

^① Donald M. Nicol, *Byzantium and Venice: A Study in Diplomatic and Culture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276.

^② A. Arakys,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Ottomans*, Athens, 1947, p.89.

的罗姆苏丹国 (The Sultanate of Rum)，奥斯曼土耳其人即是从这里发展起来的。^①

13 世纪以后，由于蒙古西侵，塞尔柱突厥人大量涌入小亚细亚，不断侵蚀拜占廷帝国在小亚细亚的领土。帕列奥列格王朝的皇帝安德罗尼库斯 (Andronikos II, 1282-1328 年在位) 当政时，国力贫弱，面对突厥人在小亚细亚的扩张，拜占廷军队无计可施，听任其势力做大，因而给其后人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13 世纪末，原罗姆苏丹的一支在小亚细亚原罗姆苏丹国衰落以后，开始建立奥斯曼土耳其国家和奥斯曼王朝统治的。14 世纪前半期，奥斯曼土耳其国家发展迅速，基本完成了对小亚细亚最重要的核心地区的征服。奥斯曼土耳其人之所以迅速崛起，除了实行政教合一的伊斯兰神权政治以外，还在于其良好的国际环境。当时，西亚地区，特别是小亚细亚地区没有强大的敌对势力，罗姆苏丹国已经瓦解，阿巴斯王朝也灭亡了，拜占廷帝国早已贫弱无力，内外交困，无暇东顾。在有利的国际环境条件下，突厥人大举扩张。到 14 世纪中期，土耳其人已经控制了黑海、马尔马拉海和爱琴海的小亚细亚西北地区，奠定了奥斯曼土耳其发展的基础。1345 年以后的半个多世纪，奥斯曼土耳其人将势力扩大到欧洲，并完成了对整个小亚细亚地区和巴尔干半岛部分地区的占领，控制了这一地区周围各个海域，成为名副其实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1383-1387 年，土耳其军队利用拜占廷帝国外交失误夺取其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②此后，土耳其人的每一步扩张几乎都是有合法的理由和外交上的借口，直到他们完成了对整个拜占廷帝国陆海领地的征服占领，以及对君士坦丁堡的包围和封锁。

早在 13 世纪时，拜占廷人完全有能力清除突厥人这个未来的隐患，但他们或是未能预见其潜在的威胁，或是忙于内战，而任其发展。而后拜占廷帝国朝野贵族更将凶猛彪悍的突厥人作为内战和对斯拉夫人作战的主力，使之发展更为迅速，正是由于帕列奥列格王朝的支持和保护，奥斯曼土耳其势力才没有被扼杀在发展的初期阶段，也没有像巴尔干半岛个小国那样相互牵制，难以发展。也是由于该王朝的亲土政策，使土耳其人获得充足的理由和借口大肆扩张，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完成了对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地区的征服。还由于该王朝的屈服，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政府扩张活动被合法化。土耳其势力强大后，拜占廷人只能唯土耳其人马首是瞻，甚至成为帮凶。约翰五世时期，作为苟延残喘的弱小国家的皇帝，完全听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命令。他不仅于 1355 年与土耳其苏丹乌尔罕签订割让色雷斯地区的条约，使他们对色雷斯地区的占领合法化，而且还不得不接受土耳其人将其首都从小亚细亚地区的尼西亚迁入欧洲巴尔干地区的亚得里亚纳堡的事实，^③并且，

^① H. Magoulias, *Doukas, Decline and Fall of Byzantium to the Ottoman Turks*, Detroit 1975, p.146.

^② G.Ostrogorsky,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p.416.

^③ G.Ostrogorsky,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p.398.

他还曲意迎合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扩张，在谈判中处处让步。1374年，约翰五世和其他巴尔干国家一样正式承认苏丹的宗主地位，并将长子安德罗尼库斯和孙子约翰的眼睛刺瞎。^①

另外，拜占廷帝国后期，皇位争夺激烈，各个皇位继承人为了在争夺皇位中抢得先机，纷纷勾结外国势力，引为外援。著名的“两安德罗尼库斯之战”就是其中一例。“两安德罗尼库斯之战”是老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二世（Andronikos II，1282-1328年在位）与其孙安德罗尼库斯三世（Andronikos III，1328-1341年在位）之间长达八年的内战。战争中，安德罗尼库斯二世与突厥人和塞尔维亚人结盟，而安德罗尼库斯三世则与保加利亚人结盟，从而为外敌入侵提供了充足的借口。后来发生的“约翰祖孙之战”，^②则彻底把送到了外敌的手中。1351年，已经成年的约翰五世起兵进攻其岳父约翰六世，意图恢复帕列奥列格王朝的正统地位。约翰五世与当时巴尔干半岛最强大的势力塞尔维亚人结盟，而此时约翰六世则暗中雇佣2万名奥斯曼土耳其士兵，大败塞尔维亚人。此次内战，使奥斯曼土耳其军队乘机顺利进入欧洲，并在巴尔干半岛建立了桥头堡和军事基地，他们将成为此后数百年欧洲的敌人和拜占廷帝国的掘墓人。^③

帕列奥列格王朝没有正确判断突厥人迅速崛起的趋势和其称霸地中海和黑海的野心，因此采取了许多有利于奥斯曼土耳其人发展扩张的政策。他们在外交事务中认敌为友，认贼为父，引狼入室，最终自掘坟墓，走向灭亡。

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开始登上东地中海的舞台，给东欧乃至整个欧洲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① A.A.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Wisconsin, 1958, p.370.

^② A.A.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Wisconsin, 1958, p.325.

^③ A.A.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Wisconsin, 1958, p.341.

^④ G.Ostrogorsky,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p.403.

第三章 东西方碰撞的东地中海世界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给同属基督教的兄弟国家拜占廷带来了灾难，属于扩张时代的西欧人把触角伸到了东方，在原拜占廷土地上建立起拉丁人的统治。从此，东西方的地理障碍被暂时打破，东西方的交流和融合出现了新的现象和特征。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获利最大的是意大利商人，意大利商人利用这次战争的胜利成果，建立起连接东地中海的顺畅的商业网络，把东地中海地区纳入了意大利人的商业版图，中世纪东地中海贸易圈出现雏形；天主教进入到东正教的传统教区，同宗宗教的冲突与相容也是这一时期的一个特征；西欧封建制的植入，必然会给东方社会带来冲击，但这也是一个适应和融合的过程，东西方贵族统治阶层的融合与同化也是这一时期的一个特色。

第一节 中世纪东地中海贸易圈现雏形

第四次十字军攻陷了君士坦丁堡，建立起拉丁人的统治，原有的贸易壁垒和商业限制被打破了。拉丁人的大量涌入，长途海运的发展，西方尤其是意大利的流动资金的进入，以及不断扩张的西方对农业和手工业的需要，都促进了本地区长途海运贸易的发展，逐渐使东地中海地区经济在中世纪时期迈向一体化，同时，也促使黑海向西方商业开放，并使其融入到地中海贸易圈。

拉丁人对拜占廷的占领，使西方的资金可以更便捷的流入，发挥“以钱生钱”的本能，意大利信贷集团的活动便是当时的一个特色。自 1270 年始，西耶那和佛罗伦萨的商业和银行公司开始大规模的信贷行动。这些意大利商人的大规模的商业活动遍及拉丁帝国的各个角落。香槟集市和英格兰、被拉丁占领的希腊的克拉伦斯、柯林斯、底比斯和尼格罗彭特都有他们的信贷中心，意大利商人和银行家发明了一种新的赚钱方式，他们运用市场化操作，投资于手工业和农地开垦。在 1240 年前的底比斯，热那亚商人在丝绸手工业中扮演了中间商的角色。总而言之，“13 世纪后半期意大利银行家、商人和管理者的出现和活动，促进了已被拉丁人占领的原拜占廷西部的农业、手工业和畜牧业的生产率、产量和利润的大幅增长，给当地经济带来了飞速发展”。^①

同时，原拜占廷地区手工业的发展也表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模式。底比斯和其它的丝织中心生产出的丝织品被运往西欧（主要是意大利），意大利城市再加工后的大量的优良

^① David Abulafia,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ume V c.1198—13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540.

丝织品和威尼斯经过技术改造后的玻璃制造，其出口的主要方向则是拜占廷，这就大大抑制了同样的手工业在希腊中西部及其附近岛屿的发展。上述地区越来越多的向西方供应原材料，并且也逐渐成为西方最终产品的消费市场。希腊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演变，就是面向西欧长途出口的重定向，这种现象在 1204 年以前的君士坦丁堡就已经出现端倪。可以肯定的是，希腊的这些地区也通过陆路、海路参与短途和地区性的贸易，包括一些季节性的贸易。随着资金的投入，拉丁人在这些活动中的份额也越来越大，“13 世纪 70 年代后，希腊人越来越依赖拉丁人的海上运输。希腊中西部的海上贸易越来越从属于被威尼斯商人和船员所把持的长途海运贸易的需求、路线以及季节性波动，这些威尼斯人很好的利用了威尼斯提供的海军和外交保护，以及其殖民地和商业基地所提供的便利条件”。^①这种演变导致了这些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出现了联结拜占廷、意大利和黎凡特的三角贸易模式。13 世纪后半期，这种主要的商业网络猖狂的海盗和私掠现象，也从侧面表明了这一时期东地中海地区海上贸易的繁荣。

君士坦丁堡陷落所带来的最主要影响之一则是促使黑海向西方商业开放。即使在 1261 年拜占廷光复后，除了特定条件下的小麦贸易，这种开放的贸易状态也没有停止。1261 年前，拜占廷政治生活中的两个重要的角色：威尼斯和拉丁帝国，都给贸易中占主要份额的商人提供保护，不管其是行商还是坐商。比萨、安科纳、阿玛尔菲和普罗旺斯的商人也参与了进来，热那亚的商人也偶见身影，威尼斯掌控下的拜占廷庞大的商业贸易使我们可以直观了解当时的商业活动范围。威尼斯在君士坦丁堡的执政官吉亚克莫·帖波罗于 1219 年、1220 年分别与尼西亚拜占廷的皇帝塞奥多利一世和科尼亚的突厥人签订停战协定来确保威尼斯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的贸易，塞奥多利一世与拉丁人在 1228 年签订条约确保其在希腊的色雷斯地区的贸易权。^②黑海方面，起初在君士坦丁堡的拉丁人日常的小麦、盐、鱼、毛皮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主要由黑海当地的商人所把持，拉丁人参与甚少。黑海商人带来的商品在君士坦丁堡转船也可销往地中海市场。就在 1239-1240 年，蒙古人在南俄罗斯巩固了统治秩序的短短时间之后，拉丁人的商业在地理上和经济上已经遍及黑海沿岸。他们中的一些居住于克里米亚半岛南部的索尔达亚，并且把它变成一个深入南俄甚至基辅的基地，且以此为据点，从蒙古向地中海出口奴隶，进行奴隶贸易。有趣的是，1260 年有两个威尼斯人经过君士坦丁堡，在他们去中国的路上，也到过索尔达亚。他们分别是著名的马可·波罗的父亲尼克罗和叔叔马修，以后几年里，在君士坦丁堡和黑海，威尼斯船只的频繁出现也表明拉丁人在此地区活动的增长。君士坦丁堡挤满了来自天主教中小型中心

^① David Abulafia,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ume V c.1198—13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540.

^② David Abulafia,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ume V c.1198—13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541.

的商人，马赛、蒙波利埃、纳邦纳、巴塞罗那、安科纳、佛罗伦萨和鲁古撒都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殖民地，有些商人甚至来自西班牙、英格兰、德意志。黑海海滨点缀着热那亚和威尼斯的殖民地。^①拉丁人占领的君士坦丁堡变成了一个重要的中继转运站，并且在黑海融入在地中海贸易圈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意大利商人还控制了此时的北非沿海贸易。意大利商人把从欧洲大陆甚至东方的手工业品带到突尼斯、博吉和休达，在那里购买羊毛、兽皮、蜂蜡、靛青、明矾和谷物。但这条路线的投资和利润都非常少，这就使非洲成为逐渐走下坡路的商人团体（如比萨、马赛和墨西拿商人）的避风港。意大利商人的船只经常的沿大西洋沿岸航行到摩洛哥。12世纪他们的终点通常是赛那，从1250年后，被更靠南的萨非所代替。

在沟通大西洋贸易方面，此时也取得了很大的突破。1277年，热那亚的平底大船开始沿加的斯和塞维尔到达法兰西、佛兰德和英格兰，他们高高的船体使停靠在拉鲁切尔、加来、南安普顿和伦敦的北方船只相形见绌。威尼斯则于1317年派出非常有名的“佛兰德大船队”来与西欧进行贸易。船队经直布罗陀到达布鲁日和伦敦。香料、明矾、谷物、酒和其他来自地中海地区和远东的物品被用来交换佛兰德的呢绒、英国的羊毛和其它物品。14世纪中期前，英格兰和佛兰德成为热那亚和威尼斯按计划派出的一年一次的航行的一个经常性的停靠地。热那亚海上贸易征税报告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当时贸易的繁荣。报告显示，海上贸易在1274-1293年间有4倍以上的增长。在1294年，热那亚港口出口需要缴纳税金的各类物品价值为3822000盾。这大约是菲利普·奥古斯都统治下的法兰西君主国收入的大约7倍，是吕卑克最好年份（1368年）海上出口的差不多10倍。^②

第四次十字军后，意大利商人的在地中海建立了众多的贸易据点和商站，与沿岸各国建立起密切的贸易关系。地中海的贸易逐渐由形成一种更加紧密的商业网络，各种商业贸易和往来比以前更加频繁和紧密了，中世纪地中海贸易圈的雏形开始出现。“当欧洲的大部分贸易仍然在集市上断断续续进行时，在地中海贸易已是在进行连续性的流动了”。^③

第二节 宗教分歧与相容

东正教与罗马天主教的斗争是基督教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两个教派原来都是基督教的主要教区，但是，在基督教发展壮大过程中，两大教区为争夺最高宗教地位展开了激

^① M. M. 波斯坦等主编，钟和等译：《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二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3页。

^② M. M. 波斯坦等主编，钟和等译：《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二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6页。

^③ M. M. Postan, *Medieval Trade and Fina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272.

烈的斗争，最终导致公开的分裂。

按照 325 年尼西亚宗教会议的决议，罗马教会在几个教区中位列首位，其次为亚历山大教会和安条克教会。后来随着君士坦丁堡的建成和发展，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君士坦丁堡教会因其特殊的政治地位而获得飞快发展，381 年基督教第二次宗教会议确定其地位在罗马教会之下其他教会之上。但是，君士坦丁堡教会不满足其基督教世界第二的地位，特别是古都罗马已经丧失其原有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后，它希望取代罗马教会的地位。451 年第四次宗教会议决定扩大君士坦丁堡教区的宗教管辖权，并明确承认君士坦丁堡教会享有与罗马教会同样的宗教特权，会议决议第 28 款指出：与罗马教区“同样的特权授予最神圣的皇都新罗马，因为这个拥有皇权和元老院光荣并享有与帝国古都罗马同等特权的城市理应在宗教事务中享有与其地位相符的权力”。^①罗马教会在日耳曼民族迁徙造成的西欧混乱中，不甘心接受其世界中心地位的丧失的现实，于是打起“彼得教会”的大旗，坚持其在基督教世界中的最高地位。两大教区在争夺最高地位的斗争中各持一端，且日趋激烈。在毁坏圣像运动期间，双方的斗争导致互不承认对方的合法性。拜占廷皇帝决定由驻拉文纳的总督监督罗马教会，并收回罗马教区在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的财政权等措施，这就加速了罗马教会脱离拜占廷帝国的过程，当意大利北部伦巴底人进攻罗马城时，罗马主教立即向法兰克王国求助。756 年，教皇史蒂芬接受法兰克宫相丕平的“献土”，开始行使其教俗君主权力相结合的教皇权，而教皇利奥三世于 800 年底为查理大帝加冕标志着罗马教会最终脱离拜占廷帝国的控制。这一事件加剧了东西方两大教会之间的对立。

拉丁教会和希腊教会不同的文化背景更使他们相互蔑视和仇恨，终于导致基督教历史上的第一次公开大分裂。1054 年，东、西教会因争夺对南意大利教区的管辖权而再起争端，关系极为紧张。同年，罗马教皇利奥九世派遣特使宏伯特前往君士坦丁堡与大教长米哈伊尔谈判基督教圣餐使用发面饼或死面饼的问题，两人各不相让，宏伯特利用在东正教最高圣坛圣索菲亚教堂作弥撒之机，宣读开除米哈伊尔一世教籍的命令，并指责“米哈伊尔及其追随者因犯有上述（使用面包作圣餐）的错误和赎神之罪”。米哈伊尔立即在宗教大会上反唇相讥，对罗马特使及其有关教徒处以破门律，指控他们“如同野猪一样来到圣城企图推翻真理”。^②这次事件直接导致基督教第一次大分裂。此后，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分别沿着各自的道路继续发展，在教义信条、宗教礼仪和组织制度等方面形成不同的特点。

在拉丁帝国统治拜占廷期间，天主教开始在拜占廷地区扩张。教皇英诺森三世把拉丁帝国的建立视为东西方教会统一的良机，他在给尼西亚拜占廷皇帝塞奥多利一世的一封信

^① A.A.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Wisconsin, 1958, p.106.

^② A.A.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Wisconsin, 1958, p.338.

中写到：“拉丁帝国的建立是作为对希腊人拒绝承认罗马最高权威的惩罚”。^①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征服者们起初通过亵渎希腊人的教堂、劫掠圣物来羞辱希腊人，被占领的拜占廷的东正教不久之后也服从于罗马教皇的权威，其组织架构仿照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的模式重新改造。由于信奉东正教的希腊人口占多数，所以其得以保留下来。事实上，与天主教的优势相比，东正教逐渐失去了它的主教席位和神职授予权，除此之外，征服者还没收了大量东正教寺院的土地财产。13世纪20年代后，不断出现的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的教士给占领区的东正教带来了更大的冲击和压力。尽管如此，东正教通过不断在希腊当地人的出现和活动，仍表现出其顽强的生命力，特别是在天主教影响未及的农村地区。征服后的几年里，希腊东正教教士向尼西亚和伊庇鲁斯东正教教会寻求帮助。深刻的民族对立情绪和社会矛盾使大部分东正教信徒拒绝承认罗马天主教的信条，拒不承认罗马教皇。他们认为教皇是第四次十字军征服君士坦丁堡的幕后支持者。1207年，拉丁帝国统治下的东正教领袖联合致信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明确坚持东正教的信条，拒绝天主教信条，声称英诺森三世所要求的最高宗教领导权应归基督教会议。在拉丁帝国统治的半个多世纪里，东正教一直采取不与罗马教会合作，不承认教皇领导权的态度。“被占领的希腊领土在大众层面传达了一种反对教皇以及忠于原有宗教信仰的信息，并且促使人们反抗拉丁统治秩序和天主教的至高无上的权力，结果，它变成了希腊种族觉醒和集体认同的凝聚点和促进力量，希腊人对拉丁征服者和他们后继者的仇恨促使拉丁帝国的崩溃”。^②

1261年拜占廷帝国帕列奥列格王朝重新占领君士坦丁堡后，主动向罗马教皇提议东、西教会和解，东正教服从罗马教皇的领导，以此来分化和瓦解西欧反拜占廷的联盟，挫败西西里王安茹的查理领导下的复辟拉丁帝国的阴谋。当时，急于扩大教皇势力范围，进而控制东正教的罗马教皇格利高里十世非常欢迎拜占廷皇帝米哈伊尔的建议，先后三次接待了拜占廷皇帝的特使。按照皇帝的吩咐，特使们一再表示接受罗马天主教的信条和礼仪，承认教皇的宗教领袖地位。1274年5月7日，教皇在法国南部城市里昂举行宗教会议，西欧各大教区和教廷的官员全部到会，拜占廷帝国代表则由前大教长日耳曼努斯和尼西亚帝国主教塞奥发尼斯率领参加了会议。代表团在会上宣读了皇帝的亲笔信，表示无条件全部接受罗马天主教的信条和承认教皇的最高宗教权威。同年7月6日，会议通过了统一宣言，宣布天主教和东正教的统一。但是统一宣言激起了拜占廷民众的一致反对，拜占廷皇帝也没有得到期待中的教皇的援助，教会统一就此搁置，东西教会的分裂状态也就保持了下来。

^① Donald M. Nicol, *The last centuries of Byzantium, 1261-145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7.

^② David Abulafia,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ume V c.1198-13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542.

第三节 西欧封建制在东地中海地区的移植：冲突与融合

第四次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后，拉丁人的涌入，给伯罗奔尼撒半岛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原有的皇帝领导下的地方大贵族统治被拉丁人所取代。伴随征服，“西欧骑士们带来了西方的制度、管理、理念和价值观”。^①西欧封建机制移植到东方，必然会给伯罗奔尼撒半岛带来冲击，同时这也是一个“适应、妥协和融合”的过程^②。

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前，西欧和拜占廷社会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拜占廷深受古希腊罗马政治遗产的影响。首先，在国家实体概念上，拜占廷存在着统一的国家，并且有代表国家掌握最高权力的皇帝，它继承了罗马的制度文明并且把它融入到政治和司法生活中去。其次，拜占廷存在着国家法律，且皇帝代表法律，尽管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着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差别，但是他们司法平等，所有自由民同处于帝国的法律保护之下。同时，在第一次十字军之前，拜占廷也出现了类似西欧“封建化”的趋势。这种趋势主要是因为11世纪末科穆宁王朝首创的“普罗尼亚制（也称监领制）”，把征税权授给地方贵族，后来又把土地连同土地上的小农一起授给地方贵族，这就导致地方贵族的坐大，这种情况类似西欧的分封，但又有所不同：这些封地授予只是授给受封者本人，而不能继承或转让；普罗尼亚制下的地方贵族并不用服兵役的方式来进行回报，他们也不是军队构成的主要力量；国家并没有授予地方贵族公共权力和司法权力来限制封地上小农的耕种。此时拜占廷的社会结构由两类人构成：一类是自由人，包括皇帝、官员、议员、平民；另一类人则是奴隶，其无人身自由可言。自由人不管其社会地位如何，他们都处于帝国同一法律的保护下。12世纪晚期的拜占廷贵族阶级并不能世袭，且不享有特殊的法律地位，整个社会阶层之间很容易出现一种流动性，整个社会的精英可以大规模的被吸收到社会上层中。拜占廷富裕起来的城镇市民成为这种社会阶层之间流动性发展的一个新的因素，“11世纪中期，拜占廷皇帝曾授予他们（新贵，富裕起来的城镇市民）中的一些以议员和高级官吏的头衔”。^③

与此同时，西欧则是另一番景象。当时西欧并不存在国家的概念，私人契约关系成为西欧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基础，整个社会由一种契约关系组合起来，十分松散，国王和封臣之间纯粹是一种由契约而定的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当然，西欧也不存在着国家法律，习惯法以及神法制约着人们的行为。社会组织在制度和实践层面上的反映则是臣服、效忠和分

^① David Jacoby, *The Encounter of Two Societies Western Conquerors and Byzantines in the Peloponnesus after the Fourth Crusad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78, No. 4.,Oct.,1973,p.883.

^② David Jacoby, *The Encounter of Two Societies Western Conquerors and Byzantines in the Peloponnesus after the Fourth Crusad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78, No. 4.,Oct.,1973,p.875.

^③ David Jacoby, *The Encounter of Two Societies Western Conquerors and Byzantines in the Peloponnesus after the Fourth Crusad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78, No. 4.,Oct.,1973,p.881.

封。骑士阶层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司法权、立法权和征税权都被骑士阶层所垄断。他们享有世袭的封地和佃农，同时要给领主服兵役来作为他们的义务。西欧社会阶层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等级性和封闭性，非贵族出身的阶级很难进入社会上层，社会阶层之间少有流动。“到 11 世纪晚期，血统已成为衡量贵族的一个重要方面；到 1200 年，骑士阶层已经变成了一个制度规则，有着自己独特的仪式、信念和责任”。^①

征服后整个社会结构进行了重构，拉丁帝国社会被明显分成两个不同的社会集团。一部分是由拉丁征服者和西方移民组成，另一部分则是由当地的希腊人组成。虽然宗教的差别不再是日常生活的主要部分，但它仍然是社会分层和个体认同的一个判别标准。信奉罗马天主教的拉丁人拥有优越的自由人地位，在这里拉丁人和自由人是同义词。同时，仍然信奉东正教的本地居民则被贬低和歧视。除了执政官阶层，不管其 1204 年前的身份、地位、或居住地，所有希腊人下降为国家的依附者。《希腊编年史》明确界定了当时的两类希腊人，执政官和依附民，后者也被拉丁人称为维兰。在拜占廷法律下，依附民是农民，尽管其受到帝国税收、宗教机构和领主的束缚和盘剥，但仍有法律上的自由，比如可以到帝国法庭中申诉，中央政府消亡后，在拉丁帝国的统治下，没有自由权的他们在法律上被认为像西方的农奴或维兰一样，法律上能够允许依附民拥有土地财产的数量和其他物品也远比拜占廷时期严格。^②在法兰克的摩里亚，法兰克骑士阶层和拜占廷执政官，比其它地区拥有更多的共同利益。这就促使法兰克骑士阶层吸收执政官和其他希腊人进入贵族阶层。他们只进行简单的效忠礼，且在封建统治阶级中拥有最低的地位，这种融合并没有影响其财产的世袭的状态，即仍具有世袭性和受 1204 年前的拜占廷法律保护。从 13 世纪中期起，特别是 1262 年尼西亚拜占廷帝国攻入伯罗奔尼撒半岛后，法兰克领主非常强烈的想保住希腊执政官的忠诚、合作和义务，因此通过封地，甚至授予他们骑士称号，进一步提高其社会地位。多数情况下这种过程并没有促使希腊人改宗天主教，也没有减少拉丁骑士与希腊贵族通婚的不情愿，许多西欧骑士回到法国和贵族的女儿结婚，随后把妻子带到摩里亚；另一些骑士则和从西方来的或摩里亚当地的拉丁女子结婚；与希腊贵族的联姻是不存在的和被禁止的。通过执政官这个事情所采取的法律和社会同化的有限性，也表明了两个集团之间的文化鸿沟依然存在。执政官社会地位的提高加强了其统治区内的传统地位，但是也剥夺了其反抗拉丁统治的意愿。

西欧骑士对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征服和融合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直到 1248 年才取得一

^① David Jacoby, *The Encounter of Two Societies Western Conquerors and Byzantines in the Peloponnesus after the Fourth Crusad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78, No. 4., Oct., 1973, p.884.

^② David Abulafia,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ume V c.1198—13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538-539.

定程度的成功。由于人口上占少数，拉丁人保留了希腊人的东正教教堂和东正教教士，同时也让以前的拜占廷法律在当地继续实行。用希腊版的《摩里亚编年史》说：“从今往后，再没有法兰克人逼迫我们信奉他们的信仰了，也没有法兰克人逼迫我们改变我们的习俗和罗马法了”。^①另外，对于土地所有权的完整性、个人权利以及拜占廷的财政系统都予以保留和保护。最初阶段的融合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只给予当地贵族一定的头衔和地位，并没有给予其封地，没有真正把希腊贵族纳入到统治体系中来，这个时期双方的融合只是一个法律信号和特征，并没有太大的没有实质性的含义。

贵族阶层的融合在 13 世纪中期逐渐超出了司法和个人层面，开始达到了一个新阶段。这一时期，出于防御尼西亚拜占廷的逐渐壮大的军事威胁的考虑，东西方贵族的融合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1248 年，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城市莫奈瓦西亚向拉丁帝国国王威廉二世投降之后，威廉二世给城市中最有影响的家族中的三个贵族赏赐封地，这大大增加了受封贵族的土地财产”。^②大规模的赐封一直持续到 1261 年底或 1262 年的头几个月。这一阶段，开始给予希腊当地贵族封地，把他们拉入到统治体系当中，以稳固拉丁人在当地的统治和抵御尼西亚拜占廷的影响。

1261 年后西方领主和希腊当地贵族建立了一种更紧密的关系。1262 年，法兰克骑士杰弗里·布瑞尔对侵入南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尼西亚拜占廷军队宣战，他分封的希腊贵族给他提供援助打败了来犯敌人。胜利后，他赏赐他的希腊封臣很多封地和其它物品，并且从中挑出显贵者封为骑士。从此，希腊贵族可以像法兰克骑士一样受封为骑士了，并且这种荣耀也变成了世袭制。从此时起，东西方贵族融合的过程基本上可以说是完成了，双方结成了一种利益共同体。

希腊贵族的融合或同化，他们原来处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封建统治阶级的最下层，从 13 世纪中期起，获得了很大的提升。这种现象毫无疑问是伴随着西欧骑士的衰落和不断增长的军事斗争以及对于当地统治的需要而出现的。但是，希腊当地贵族受封人数总体而言并不是很多，希腊贵族很难进入男爵阶层；此外，东西方贵族之间的通婚仍然是禁区。

希腊贵族原有的世袭财产受拜占廷习惯法的支配，可以分成平均的几块留给继承人，并且可以免除对领主的兵役，而西欧领主分封给希腊贵族的土地则不能分割给继承人。由此，希腊贵族为了避免分封土地带来的义务和限制，尽量把分封土地转化为世袭土地，这就引起了法兰克领主的不满，他们主张对王国内所有土地上的所有贵族，无论是法兰克人

^① David Jacoby, *The Encounter of Two Societies Western Conquerors and Byzantines in the Peloponnesus after the Fourth Crusad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78, No. 4., Oct., 1973, p.890.

^② David Jacoby, *The Encounter of Two Societies Western Conquerors and Byzantines in the Peloponnesus after the Fourth Crusad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78, No. 4., Oct., 1973, p.892.

还是希腊人，都要强征兵役，这就激起了希腊贵族的强烈不满，导致双方关系的在一定程度上紧张。

尽管双方有时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紧张关系，但是双方的融合还是的效果还是显著的。法兰克骑士的标准、价值观和理念在摩里亚逐渐盛行，西欧的封建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移植到了东方，使东方在文化和观念以及统治方式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摩里亚也进入了西方式的发展轨道。

结语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不仅在十字军东征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而且它在整个欧洲中世纪史上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苏珊·里德亚德认为这是“中世纪一个对东方具有转折性的历史事件，它也属于欧洲扩张时代的一部分”，同时也“使拉丁人对东方有了比较切实的看法，增强了拉丁人的自信，促使拉丁人更加大胆的开创自己的事业”。^①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之前，西方一向认为欧洲的核心地区在拜占廷，繁荣富饶的拜占廷吸引着每一个欧洲人，拜占廷拥有强大的国家实力，它是不可战胜的，虽然有突厥人的威胁，拜占廷皇帝向西欧求助，请求十字军帮忙，但是拜占廷强大的面貌还是刻在西欧人的脑海里；而第四次十字军的“转向”则让西欧人看清了拜占廷的虚弱与衰败，虽然宗教观上同宗，发生的事情受到谴责，但是攻陷君士坦丁堡还是让西欧人感受到自己的力量，不可一世的拜占廷并不是一座大山，西欧的力量也是非常强大的，西欧的发展开始有了自己的文化和历史轨道。

拜占廷在十字军东征以前国家就已出现了衰落的迹象，军区制的瓦解、小农经济的破产以及大地主贵族的兴起，这些都是拜占廷帝国衰落的主要原因。国家力量的下降，使拜占廷在第四次十字军的冲击下不堪一击，君士坦丁堡很快陷落。第四次十字军的征服使拜占廷走上了另一条历史发展道路，帝国瞬间四分五裂，历史上声名显赫的拜占廷帝国就此走上衰亡的道路，虽然以后君士坦丁堡被收复，但是其国家命运早已在攻陷君士坦丁堡那一刻就决定了。

第四次十字军还使意大利航海国家的力量凸现出来，威尼斯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直接导演了这场战争，战后的利益分配它也分得最多，占领了威尼斯通往君士坦丁堡的诸多岛屿和海上要塞，同时，威尼斯也充分利用了这种便利，在半个多世纪里垄断了东地中海地区的贸易，初步建立起威尼斯海上商业帝国；热那亚虽然没有参加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但是威尼斯的活动损害了它的利益，于是，两国的战事遂起，两国的战争遍及整个东地中海地区，对该地区影响甚大。另外，拜占廷的衰落也使塞尔柱突厥人有机可乘，迅速发展了自己，并在后期拜占廷发展史上体现出重要地位，扮演了拜占廷毁灭者的角色，给后来的欧洲格局造成巨大的影响。

不过，事情要分多个角度去考虑，第四次十字军虽然给拜占廷带来了灾难，但是它也极大的促进了东地中海地区的互动与交流，贸易方面，出现了一个连接东地中海的商业网

^① Susan J. Ridyard, ed., *The Medieval Crusade*, The Boydell Press, 2004, pp.221-223.

络，这时候经济交流十分活跃，意大利商人的脚步遍及东地中海的各个角落；西欧人的到来，把天主教信仰也带到拜占廷，在拜占廷出现了原有的东正教和新来的天主教两种宗教并立的状态，一开始虽然有宗教压迫和歧视，但是，由于在一个信奉东正教人口占多数的地区推行天主教，民族对立情绪十分严重，于是，两种宗教并存的状况就保留了下来；西欧骑士的到来，也把西欧的封建分封制移植到了拜占廷，拜占廷也出现了许多类似西欧的封国封地，作为统治阶层的西欧骑士为了稳固统治，这时候也极力拉拢原拜占廷贵族进入当地的统治阶层，并且极力提高原拜占廷贵族的政治地位，于是东西方贵族开始融合，西方的价值观和理念在一定程度上移植到了拜占廷。

总之，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给东地中海地区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不但有局部的裂变，也有整体的互动与交流，这种跨文化、跨地区的交流促进了东西方的认识，此次事件在短暂的时间中孕育了深远的影响，使后来东西欧的发展进程呈现出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中文论著:

- 1、张广智:《西方史学史》,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 2、[苏]扎波罗夫:《十字军东征》,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9 年版。
- 3、陈志强:《拜占庭帝国史》, 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
- 4、陈志强:《拜占庭学研究》, 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 5、[南斯拉夫]乔治·奥斯特洛格斯基:《拜占廷帝国》,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 6、[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 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 7、M. M.波斯丹等主编, 钟和等译:《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二卷),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英文史料:

- 1、Alfred J. Andrea, *Contemporary Sources for the Fourth Crusade*, Brill, 2000.
- 2、Villehardouin and De Joinville, *Memoirs of the Crusades*, translated by Sir Frank Marzials, London: J. M. Dent&Sons, Ltd., 1911.
- 3、Robert de Clari,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translated from the Old French of Robert of Clari by Edgar Holmes Meneal*,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6.
- 4、Marcia Merryman Means and Neil Sohlager, eds., *The Crusades: Primary Sources*, Thomson Gale, 2005.
- 5、Ellen E. Kittell and Thomas F. Madden, ed.,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Venic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9.
- 6、Robert S. Lopez and Irving W. Raymond, *Medieval Trade i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llustrative Documents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 7、Charles T. Davis, ed., *Western Awakening: Sources of Medieval History Volume II(c. 1000-c. 1500)*,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67.

英文论著:

- 1、Donald M. Nicol, *Byzantium and Venice: A Study in Diplomatic and Culture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2、Jonathan Harris, *Byzantium and the Crusades*, Hambledon and London, 2003.
- 3、Charles M. Brand, *Byzantium Confronts the West, 1180-1204*, Gregg Revivals, 1992.
- 4、Krijnie Ciggaar, *Western Travellers to Constantinople: the West and Byzantium, 962-1204: cultural and political relations*, Brill, 1996.
- 5、Jack Lindsay, *Byzantium into Europe: The Story of Byzantium as the First Europe(326-1204 A. D.) and its further contribution till 1453 A. D.*, The Bodley Head, 1952.
- 6、Donald E. Queller and Thomas F. Madden, *The Fourth Crusade: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with an essay on primary sources by Alfred J. Andre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7.
- 7、W. B. Bartlett, *An Ungodly War: The Sack of Constantinople & The Fourth Crusade*, Sutton Publishing, 2000.
- 8、David Jacoby, *Studies on the Crusader States and on Venetian Expansion*, Variorum Reprints, 1989.
- 9、Edward E. Morris, ed., *Epochs of History: The Crusades*,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00.
- 10、Marcia Merryman Means and Neil Sohlager, eds., *The Crusades: Almanac*, Thomson Gale, 2005.
- 11、Marcia Merryman Means and Neil Sohlager, eds., *The Crusades: Biographies*, Thomson Gale, 2005.
- 12、Susan J. Ridyard, ed., *The Medieval Crusade*, The Boydell Press, 2004.
- 13、Jonathan Riley-Smith, *The Crusades: A Short Histor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14、Christopher Tyerman, *The Invention of The Crusades*, Macmilian Press, 1998.
- 15、Micheal Angold, *The Byzantine Empire, 1025—1204: A political history*, Longman, 1997.
- 16、Timothy E. Gregory, *A History of Byzantium*,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 17、MRS. Oliphant, *The Markers of Venice: Doges, Conquerors, Painters and Men of Letters*,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05.
- 18、Thomas Okey, *The Story of Venice*, J. M. Dent&Sons, Ltd., 1931.
- 19、John Guthrie, *Venice and Its Lagoon: Historical-Artistic Guide*, Edizioni Lint Trieste, 1985.
- 20、De Lamar Jensen, *Renaissance Europe: Age of Recovery and Reconciliation*, D. C. Heath and Company, 1981.

- 21、David Luscombe and Jonathan Riley-Smith, eds.,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ume IV c.1024—1198, Part I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22、David Abulafia, eds.,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ume V c.1198—13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23、M. M. Postan, *Medieval Trade and Fina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 24、Benjamin Z. Kedar, ed., *East-West Trade in the Medieval Mediterranean*, Variorum Reprints, 1986.
- 25、David Jacoby, *Trade, Commodities and Shipping in the Mediterranean*, Variorum Reprints, 1997.
- 26、David Abulafia, *Mediterranean Encounters, Economic, Religious, Political, 1100-1550*, Variorum Reprints, 2000.
- 27、Carlo M. Cipolla, *Money, Prices,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Fifth to Seventeenth Century*, Gordian Press, 1967.
- 28、Yaacov Lev., ed., *War and Society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7th-15th century*, Brill, 1996.
- 29、David Abulafia,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editerranean, 1100-1500*, Variorum Reprints, 1993.
- 30、Johann P. Arnason and Björn Wittrock, eds., *Eurasian Transformations, Tenth to Thirteenth Centuries: Crystallizations, Divergences, Renaissances*, Brill, 2004.
- 31、Robert Bartlett, *The Making of Europe: conquest, coloniz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950-1350*, Allen, 1993.
- 32、A. Arnakys,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Ottomans*, Athens, 1947.
- 33、H. Magoulias, *Doukas, Decline and Fall of Byzantium to the Ottoman Turks*, Detroit 1975.
- 34、G. Ostrogorsky,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 35、A. 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Wisconsin University Press, 1958.

英文论文:

- 1、David Jacoby, The Encounter of Two Societies Western Conquerors and Byzantines in the Peloponnesus after the Fourth Crusad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78, No. 4.(Oct.,1973),pp.873-906.

- 2、Horatio F. Brown, The Venetians and the Venetian Quarter in Constantinople to the Close of the Twelfth Century, *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Vol. 40, Part 1.(1920),pp. 68-88.
- 3、Alfred J. Andrea, Pope III as Crusader and Canonist: His Relations With the Greeks of Constantinople, 1198-1216, *Church History*, Vol. 39, No.,1.(Mar.,1970),pp. 133-134.

致谢

时光荏苒，转眼间三年的硕士生活即将结束，回首往事，感慨最多的就是这篇论文。从论文资料的外出搜集，再到一句句的斟酌翻译，然后到思路的梳理和论文的写成，虽然有辛苦和忙碌，但是也有收获和喜悦！在此，我要衷心地感谢我的导师夏继果教授！从这篇论文的选题，到后来的构思和写作，再到修改，无论是论文的逻辑和结构，还是文中的字句和标点，夏老师都不辞辛劳地给予了我细心的指导。除了学业上的谆谆教导和严格要求，在生活上，夏老师也给予了我无私的关怀和帮助。在精神上，夏老师更是经常鼓励我要自信、坚强。在此，向夏老师表示深深的感谢！

此外，我还要感谢施诚老师！在上他的近代早期欧洲研究课时，我从中获得了许多灵感和启迪，同时施老师还传授我们全球史的许多研究方法和动态，都使我受益匪浅。同时也要感谢师姐王建妮和李玉华在论文方面提出的建议！

最后，感谢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为我借阅资料所提供的便利和帮助！

由于自己孤陋寡闻、才疏学浅，论文中难免存在不足和不当之处，恳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以使我在以后的求学路上能够取得更大的进步！

代成兵

2008年5月于首都师范大学